

□ 本报记者 卢星
本报实习生 杨海晴

访得武氏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农历八月中旬。夏日的暑气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河水混合的气息。42岁的新任卫河通判黄易,正在从开封返回济宁的路上。

自1778年开始,老家浙江钱塘的黄易一直在东河总督担任幕府。这一选择与家族治黄的履历有关,他的父亲黄树穀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在友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

当时,两河是朝廷的命脉之一。自雍正七年(1729年)以降,设北河、东河、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此时的黄易,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河堤抢护,心中仍残留着洪水咆哮的回响。悬河自古多凶险,在次年给朋友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告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此际也督率员弁,奋力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大人,前方就是嘉祥县城了。”随从轻声提醒。

黄易点了点头,和随从穿越热闹的县城,到县署稍事停留。他翻出书架上陈列的《嘉祥县志》,目光扫过一行字:“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指出“中有一孔”,黄易随即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便遣人前往推估。由于此碑数十年前被当地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识读完拓片后,黄易心头一震:这不是西汉太子墓,而是东汉建和元年(147年)所立的一块古碑。

此时,黄易在脑海里打捞出一系列线索,他首先联想到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所写:“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嘉祥,为古任城地,与赵氏之说契合。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则将这些画像更精确地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并摹刻了画像与题赞。在当时,武梁祠画像只有拓本流传,赵、洪二人都未曾真正到过这个祠堂,故洪适为武梁祠定名之后,自信地声称:“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斯言以求是。”

因缘际会,“后之人”黄易接力而行。早在十几年前,黄易曾在扬州秋声馆观摩过《唐拓武梁祠画像》,觉古香可爱,为之心醉。此时,他心中的金石种子正在萌芽。

拿到拓片后,黄易挑了一个清凉天,邀好友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奔赴嘉祥。一行人顺着百姓指引,来到紫云山下,从向导那里询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置”。由于代代河能填淤,建造于汉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得益于汉太子墓的讹传,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将之当作皇陵,故即便碑石纵横,却历久不毁。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黄易和好友开始清理荒草,挖掘泥土。很快,《武梁祠堂画像》三石、《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武氏祠双阙相继出土。这些连同先前发现的《武斑碑》,都曾为赵、洪二家著录。

当年冬日,黄易给杭州友人何梦华写信,谈及此次访碑收获:“此间汉魏六朝碑碣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石,不足尽兴,其他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石念军

位于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氏祠,现存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碑以及汉画像石群。近日,央视《新闻联播》点赞济宁武氏祠,称其为“石刻上的华夏文明”,山东丰富的石刻文化资源再次引发关注。

作为石刻文化的重镇,山东不仅有数量居全国首位的秦汉碑刻,而且类型丰富、规模庞大、水平卓越。泰山岱庙,《李斯刻石》以残存的“9个半”字,实证2000多年前的封禅历史;曲阜孔庙,两千年前的《乙瑛碑》记录了汉代尊孔盛典;经石峪里,逾千平方米的花岗岩溪床上镌刻的整部《金刚经》,以“大字鼻祖”名扬世界;莱州云峰山上,郑道昭的《郑文公碑》开创魏碑新风……

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瑰宝如一部部“石头百科全书”,是齐鲁文化的历史印证,也封存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从这个角度讲,武氏祠被关注不仅是武氏祠的幸事,更为推动山东石刻文化加速融入当

紫云山下,静静伫立,向世人讲述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奇旅

『碑痴』唤醒武梁祠



复原武梁祠

次年仲春,大地解冻,黄易和好友重返紫云山。

这一次,他们又有新发现: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残石三。这三种为前人载籍所未有,黄易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与《武氏祠祥瑞图》。在距离发现地一二里之外,黄易又得画像二石,因无题字,难以确定为何室之物。

其中,《武氏后石室画像》的一百六十余字隶书,风格竟与著名的《曹全碑》极为相似。《曹全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郃阳,清初周亮工(1612—1672)称之为“天留汉隶一线”,明末清初的隶书名家无不称于此。黄易激动不已,亲自批校拓本,送给翁方纲、钱大昕等学者研究。

黄易还请人将这次探碑的过程画成《紫云山探碑图》,请好友李东琪题字“奇文共欣赏”。他在画款中写道:“乾隆丁未二月十有八日,与李铁桥、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访汉武氏诸碑刻,欣赏竟日而还,为图记之。”

这不仅是一次考古发现,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奇旅。

黄易并未满足于“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他看到那些散落荒野的碑刻,日晒雨淋,无人问津,牧童樵夫亦不知珍惜,若不及时加以保护,恐怕将再次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这些古物因他而重见天日,若置之不顾,未免有负古人的一片苦心。于是,将它们复原并妥善保存,便成了黄易肩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其中石刻与孔子有着密切关联,黄易遂将尤具价值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至济宁州学,以供学子瞻仰研习。至于《武斑碑》等其余碑刻,本拟与《武梁碑》一同立于学宫之内,然石材质地厚重、体量庞大,长途迁徙殊为不易。经与好友反复商议,黄易最终决意因地制宜,在原址之上创建祠堂,使诸碑石得以安身,历久长存。如此一来,不仅可令古物延其寿命,亦能使人知其珍贵,从而生发敬慎爱惜之心。

1787年六月,武梁祠开始兴工,直到1794年才完成。由于黄河泛滥,汉人建造石室、石阙之地早已淤高,有些碑石长年沉埋土中。黄易在复建武梁祠时,决定平治地基数尺,让所有碑刻重见天日。

苦心人,天不负。《武氏左石室画像》便是1789年7月平治祠基时所得,督工建祠的工匠在题识中记录,一共续得十石,隶书106字,为古人所未见者。这些发现再一次减少了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复原成为可能。

黄易站在新建成的祠堂前,望着那些熟悉的画像与文字,仿佛听见千年前的凿刀声仍在山谷回荡。

舞台演绎和数字化传播。央视《典籍里的中国》《简牍探中华》《帛书传奇》等文化节目,通过话剧、舞台剧等形式,讲述史料典籍背后的故事——帝王的雄心、书家的痴情、工匠的巧思、古人的悲欢等活灵活现。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泰山经石峪的千年沧桑、郑道昭父子在云峰山的艺术追求、武氏祠画像石描绘的汉代生活画卷等打造为形象生动的内容IP。

文旅融合,设计主题鲜明的“山东石刻文化之旅”,将散落的“珍珠”串联成链。“书法朝圣之旅”可以串联泰山(经石峪)、莱州云峰山(郑文公碑)、平度天柱山(郑文公上碑)、曲阜(汉魏碑刻),让书法爱好者一路追寻书体演变的足迹;“汉画像石探秘之旅”可贯通济宁(武氏祠)、枣庄(汉画像石馆)、临沂(吴白庄汉墓、银雀山汉简),揭开汉代社会生活的神秘面纱。摒弃走马观花、引入深度体验,还可以推出拓片制作体验,感受墨香与石韵的交融;利用VR技术“化身”古代工匠,体验在坚硬山岩上篆刻的艰辛与智慧,这都有助

金石亦时尚

武梁祠本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乃武氏兄弟为其母造阙。二子武梁于元嘉元年病逝,子孙为之“前设坛埳,后建祠堂”。

经过三代人二十余年慎终追远的匠心构建,它成为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库藏。

黄易深知,金石不仅是文物,更是文化的密码。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书法、训诂、历史、礼制,皆可从中窥见端倪。

黄易开始命工精拓画像与题字,广赠同好。文人争相索要拓片,互赠交流,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内閣中书潘有为曾写信给黄易说:“可知金石亦时尚也,呵呵!”

“武梁祠”这一文化符号,也由此飞往全国各地。

当时的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收到拓片后,欣喜若狂,提笔赋诗,并遗憾自己未能亲临其境。此后,钱大昕、王昶、桂馥、王念孙、阮元、瞿中溶等学者在新拓本的基础上,从文字、声韵、名物、历史、艺术等各个角度,考证碑文、分析字体、比对史实。

钱大昕通过榜题中的“范且”二字,指出战国秦汉时期以“且”为名者甚多,如穰且、豫且、夏无且、龙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范雎之“雎”注音为“虽”,显然是误“雎”为“隹”。

瞿中溶则从艺术角度出发,称这些画像“人物动作之间皆有神气,后代画师盖无能出其范围者”,是中国画学的宗祖之作。道光五年(1825年),他更是荟萃平昔所记,成《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特别指出武梁祠堂画像所刻古来帝王圣贤及孝子忠臣、烈士节妇故事,目的是告诫子孙,与汉代祠堂、宫殿壁画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复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多年以后,当黄易站在武梁祠前,抚摸着冰冷的石刻,心中一阵暖意袭来。

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让古老文明重现人间的读书人,更是名实相副的碑痴。

在他心里,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除了对汉代武氏祠石刻的发掘,复原与保护,黄易对石刻做了大量的分区域的实地调查,勘查记录原石情况,升碑、洗碑、拓碑,并写访碑日记将调查的全过程如实记下,为编目和考证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其他画家的访碑、读碑图不同的是,他画的是完全纪实的科学图谱式的。他将家藏宋拓汉石经残石、武梁祠画像及榜题、魏元丕碑、范氏碑和成阳灵台碑、朱龟碑、谿敏碑、赵君碑、王稚子阙、祀三公山碑拓本双钩后印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促进交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认为。

施安昌还指出,黄易金石考古活动的独到之处:即文献、碑拓研究与原地实物调查并重;古物发掘,复原与保护陈列并重;搜求碑拓善本与钩摹刊布并重;和同时代的学者来比,他确有更多的求本溯源的科学精神和集古为公的公益观念。在他去世后一百多年,近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才相继传入我国并蓬勃发展。追思黄易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令人钦佩。若称金石家,不足,称金石考古学家则宜。

1915年末,鲁迅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当时,鲁迅抄碑、校书所参考的诸多金石学古籍,都论及武梁祠。为此,鲁迅还画出全山东碑刻所在地,绘山东嘉祥县图,以及武梁祠石刻全图。如此得来数百张武梁祠、嘉祥及山东他处的石画像拓片,大抵都是鲁迅居留北平时时期所得。此后,“武梁祠”不断出现于鲁迅的精神版图中。

武梁祠石像多有车骑出行场面,反映了汉人对自己作为世界第一等大国国力的自豪感,也就是鲁迅所赞赏的“汉唐魄力”的折射。汉画像也是一面镜子,照见鲁迅的一种心愿,魂牵梦萦于东方美之生命的复兴。

而今,紫云山下,武梁祠静静伫立,向世人讲述独家记忆——关于一位文人,在那个秋天,悄悄唤醒自己的故事。

于山东石刻文化的出圈。

融入当下,丰富石刻文化的时代价值。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在于对当下生活的滋养与影响。山东石刻中蕴含的书法艺术、精美纹饰、历史故事,是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记者日前到泰山、东岳山居调研,其主理人谢云燕正在尝试将泰山石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各种手串和挂件受到粉丝的好评。是不是可以借鉴“故宫猫”“敦煌飞天”等IP样本,为泰山石刻或武氏祠画像石打造系列文创产品?开发系列绘本、动画短片甚至轻游戏,让青少年在趣味中接触传统文化。

多元传播,拥抱新媒体扩大影响面。信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可以邀请文化学者、书法名家、文博达人,在商业平台制作系列短视频,激发公众尤其是年轻人“我为家乡石刻代言”的参与热情。

让沉默的石刻瑰宝“活”起来,“火”起来。相信随着多方力量的协同助力,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齐鲁文明史,一定能成为每一个山东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散发出独特光芒。

泱泱华夏文明史,刻在武梁祠画像中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随着舞台中央的长卷缓缓展开,来自汉代的《孔子见老子》图徐徐呈现在世人面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张图的原型正是来自武梁祠画像。

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记》

东汉晚期,世代为官的武氏家族,看中了嘉祥县城南10公里处武翟山北麓的风水宝地,在此修建家族墓地。武氏墓群包含至少三座祠堂以及墓室、石碑、石阙、石狮,“武梁祠是唯一一个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祠堂,是历史文献最早记录的祠堂,同时也是整个武氏祠的精华与核心,后世学者常用武梁祠来代指整个武氏祠。”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馆长朱卫华表示。

汉代石祠堂形似房屋却无门扉,是子孙后代祭祀、追思祖先的场所。随着庄园经济的盛行和东汉举孝廉制度实施,画像石作为孝道思想的一种体现,逐渐由墓内转移到地上祠堂,雕刻技法达到鼎盛。

武梁祠屋顶、内壁上刻满了画像,数量众多、雕刻精美,全国罕见。从雕刻技法上看,它继承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创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在世界艺术史上,武梁祠和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相提并论,是标志性范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认为。

从题材内容看,武梁祠画像可大致分为神话传说、经史故事、现世生活三种类型。

神话传说部分瑰丽精彩,主要包括人类始祖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等仙界领袖及远古君王,天界水府“自然神灵”,龙凤图腾,仙人出行及“四方神灵”,各种奇禽异兽、祥瑞灵异等。这类内容通常刻在石祠山墙的顶部。

经史故事部分内容最为丰富,占据面积最大。主要包括圣贤名臣故事,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刺客故事,如荆轲刺秦王;孝子贤孙,如曾子、闵子骞、孝孙原谷等;义士善人、贞妇烈女。旁边还有针对所刻人物的题铭和赞语。

现世社会生活部分逼真翔实,主要包括车马出行、人物聚会、谒见讲经的场面;庖厨宴饮、切割屠宰、汲水和其他生活图景;狩猎捕鱼的劳动场面;乐舞百戏、杂技棋艺、武术格斗等场景;军事战争场面;楼阁、亭台、阙桥等建筑物。这类图像位于祠堂中心后壁的最明显之处,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真实情况的集中展示。

与编撰史书的文人不同,画像石的作者都是基层工匠。和司马迁、班固一样,他们也生活在汉代,他们或许不识字,也不会书写,但会以图画的形式,记录和描绘汉代的形象。武梁祠画像和文字一样,异曲同工,是汉代历史的记录。“较之文字的概括和抽象,汉画像石更直观、更具象,较之实物,汉画像石有动作、有表情、有场面、有背景。这些图画形象,是另一种历史的撰写方式,是庶民百姓对身边事物的图画记录,是对他们所了解的过往历史的形象描绘。这是图画的历史。”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像研究所所长张从军表示。

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卷之中,有些是现存最早的,有些是现存最完整的,极具唯一性和稀缺性。所以,武梁祠的许多画像已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比如,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像、联合水帘宫中的大禹塑像,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伏羲女娲、荆轲刺秦王等,均取材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的阙室里面,还保存着3个中国之最:一对石狮子,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有文献记载的、雕刻成型且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石狮子;两块汉碑,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汉碑;还有一个是目前保存在中华大地上最为完整的一组石质结构的子母双阙。

绕不开的艺术史高峰

武梁祠画像石因其刻石年代早,且有画像和铭文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很早就吸引了学者的目光。

有关武梁祠的研究可追溯到宋代,见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中。至南宋,洪适在其《隶续》中对武梁祠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记述,并将其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由此构成了第一拨武梁祠的研究高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一件《宋拓武梁祠画像册》。

宋廷为抵御金人,开决黄河大堤,导致嘉祥一带河水泛滥,武梁祠掩埋地下,逐渐被人遗忘。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运河河官黄易途经嘉祥,查阅县志时发现一段关于石刻的记载。黄易好奇,尤嗜金石,随即前往。他分析认为,石刻并非汉太子墓,而是已经消失许久的武梁祠,并组织进行清理和保护。随后,瞿中溶、翁方纲等学者都对武梁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进入20世纪,罗振玉、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也参与对武梁祠的研究,并由传统金石学的考据释读转向文化史、艺术史等领域。严复借由研究武梁祠画像,提出将中国艺术置于世界舞台上进行中西比较,结合西方思想,以新的观念和视角审视中国艺术和文化。鲁迅喜爱收藏汉画像石拓片,而武梁祠画像拓片正是他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

此前,一些古董商从武梁祠画像图片中发现了商机,大量拓印贩卖,武梁祠画像为中外收藏家熟知,并流传到海外,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法国汉学家沙畹于1891年和1907年两次访问了武梁祠,他发表的文章成为西方研究东方文化的学术经典之一。日本考古学家关野贞和大村西崖也于1907年造访了武梁祠,其研究在日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面积仅有3平方米的武梁祠,至今仍是国际汉学的研究热点。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先后开设了相关研究机构。2005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有关汉代武梁祠的专题展览,出版了一本六百多页的图录,并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所说:“武梁祠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小小祠堂本身所限定的范围。可以说,对它的研究已使它变成各种相互补充或对立的理论及方法论之间的竞技场。”